

《蜀鑑》

校注

（宋）郭允蹈撰
趙炳清校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蜀鑑》

校注

（宋）郭允蹈撰
趙炳清校注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蜀鑑》校注 / (南宋) 郭允蹈撰; 趙炳清校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013-4351-5

I. ①蜀… II. ①郭…②趙… III. ①西南地區-地方史-兩宋時代②蜀鑑-注釋 IV. ①K297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0) 第 066529 號

書名 《蜀鑑》校注

著者 (宋) 郭允蹈撰 趙炳清校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漢玉印刷有限公司

開本 889 × 1194 (毫米) 1/32

印張 10

版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2000 冊

書號 ISBN 978-7-5013-4351-5

定價 30.00 圓

前言

一、《蜀鑑》的作者與體例

南宋郭允蹈的《蜀鑑》是一部西南地區的通史著作。它記載了四川及其周邊地區在宋代以前的歷史發展變化，史料價值極高。在歷史編纂學上，《蜀鑑》熔紀事本末體和綱目體為一爐，提供了新的歷史表述方法。《蜀鑑》具有明確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總結了歷代經略蜀地的得失，探討了各關隘要地在攻守中的戰略地位，為南宋政權抵禦蒙古保有蜀地提供資鑒。因此，《蜀鑑》具有很高的史學價值，是一部重要的歷史著述。

郭允蹈，《宋史》無傳，事蹟不詳。然在四庫館臣以前，《蜀鑑》多題為李文子著^①。方孝孺在《蜀鑑序》中就稱“宋端平中，昭武李文子嘗仕於蜀，蒐擇史傳，自秦取南鄭至宋平孟昶，上下千貳百年事繫乎蜀者，為書拾卷。凡國統之離合，地勢之險易，賢才之盛衰，攻守之得失，與夫忠順致福之效，逆亂取禍之原，莫不畢舉而詳之，名曰《蜀鑑》”^②，認為是李氏所著。甚至早在元初，胡三省就認為《蜀鑑》是李氏的作品，其為《通鑑》作注中云：“近世有李文子者，蜀人也，著《蜀鑑》曰：南鄭自南鄭，漢中自漢中。”^③

其實，只要仔細考察李文子為《蜀鑑》所作的序、跋，我

① 如焦竑《國史·經籍志》、祁承燾《澹生堂藏書目》、徐燾《徐氏家藏書目》均作《蜀鑑》為李文子撰。

② 方孝孺：《蜀鑑序》，見郭允蹈：《蜀鑑》，成都：巴蜀書社，1984年。以下李文子關於《蜀鑑》的序跋、別某的跋語，均見於此。

③ 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305頁。

們就不難做出正確的判斷。宋端平三年（1236）李文子所作的序中稱“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資中郭允蹈緝為一編。”《蜀鑑》卷末宋嘉熙丁酉（1237）重五日李文子的跋亦云：“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為《蜀鑑》一編，使凡仕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為龜鑒，其事備矣。”又淳祐五年（1245）古郢別跋云：“余向帥江陵，郭湛溪仕蜀而出，遂為江陵寓公。每語余以蜀事，而不知其著此書也。後十餘年，蜀道洶洶，余自邇列出鎮長沙，名為托裏。而其子涉出示此書，於是湛溪即世亦幾十年矣。”可見《蜀鑑》一書確為郭允蹈所著，李文子只是此書編撰的策劃者。為《蜀鑑》作者正名，四庫館臣居功甚偉^①。

根據上述的題跋，余嘉錫先生結合宋末蒙古攻蜀之史事，對郭氏事蹟進行了考證^②。他認為郭允蹈名居仁，自號湛溪，在宋寶慶、紹定間出蜀寓居江陵，並於宋端平三年《蜀鑑》成書後不久即去世。同時，余先生還認為作跋的古郢別某是別之傑^③。別之傑，字宋才，郢州人，《宋史》卷四一九有傳。曾兩知江陵，先後兼湖北安撫使與京湖制置副使。淳祐二年以同知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進資政殿學士的身份出任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郭允蹈出蜀居江陵時，別之傑尚在江陵任上，故得友善而相論蜀事，時允蹈也未作《蜀鑑》。端平三年，蒙古軍大舉攻蜀，一月之間，成都府、利州及潼川府三路全部陷落。李文子曾

① 在《各省進呈書目》中，四庫館臣已注明“《蜀鑑》十卷，宋李文子（其實乃宋郭允蹈所撰）。”見吳慰祖校訂：《四庫采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第59頁。

② 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辯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198—199頁。

③ 清周中孚在《鄭堂讀書記》卻認為別某為李文子門人。實誤。見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卷十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萬有文庫本，第375頁。

知潼川府^①，東奔江陵而與郭允蹈遇，鑒於蜀事殘破與後來治蜀者深思，故囑允蹈編撰《蜀鑑》。書成不久，允蹈去世，當在端平三年末。淳祐五年，別之傑鎮守長沙，允蹈之子郭涉出示《蜀鑑》，時距允蹈去世將近十年了。其間，蜀在余玠經營下，元氣猶復。

宋室南渡，偏安江南，長江成了整個王朝依賴的天險，而四川據江之上游，若入敵手，順流而下，則東南不保。南宋一代的學者對此多有認識。真德秀就認為南宋防禦要害，“近則兩淮、荆襄，遠則蜀之關外，然以地形考之，蜀居上游，實東南之首，荆襄其吭，而兩淮其左臂也”^②。曾開也上疏稱“車駕撫巡東南，重兵所聚，限以大江，敵未易遽犯。其所窺伺者全蜀也，一失其防，陛下不得高枕而臥矣”^③。可見，在南宋的戰略防禦體系上，四川的地位顯得特別的重要，具有“首”、“頭目”之稱，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正如文子序中所言“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

為了更好地經營四川，總結歷代治蜀的得失就顯得十分的必要了。據史書記載，在郭允蹈之前，已有吳昌裔的《蜀鑑》問世。吳昌裔乃中江（今四川省中江縣）人，在蜀中任官多年，深知蜀地對南宋存亡的重要性，多次上疏要求朝廷重視蜀中形勢，多次言及蜀地歷史與山川地理，並“會粹周、漢以至宋蜀道得失，興師取財之所，名《蜀鑑》”^④。可見，吳氏《蜀鑑》

① 《考亭淵源錄》記載：“李文子字公瑾，光澤人。李方子之弟。紹熙四年進士。歷知太安軍，綿、閬州，潼川府。著《蜀鑑》十卷。”見《考亭淵源錄》卷二十二，《李文子傳》，載《續修四庫全書》第517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85頁。

② 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直前奏劄二》，《四部叢刊初編》本。

③ 見《宋史》卷三八二，《曾幾傳附曾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1770頁。

④ 見《宋史》卷四〇八，《吳昌裔傳》，第12301—12304頁。

不僅記載了蜀地的政治得失，也記載了蜀地的經濟和軍事。惜其書不傳。宋嘉定之後，蜀地頻年被兵，先是金人，後是蒙古，致使山河殘破、生靈塗炭。于此之時，軍事策略無疑成為了蜀地經營者的首選。故郭氏《蜀鑑》多關軍事與地理，正如四庫館臣所言：“是書所述，皆戰守勝敗之跡，於軍事之得失，地形之險易，恒三致意。”^①其與吳氏《蜀鑑》當甚有差別。

關於《蜀鑑》的體例，四庫館臣也所言甚明。其曰：“其書每事各標總題，如袁樞《通鑑紀事本末》之例；每條有綱，有目，有論，如朱子《通鑑綱目》之例。其兼以考證附目末，則較《綱目》為詳贍焉。”可見，《蜀鑑》將紀事本末體與綱目體融為一爐，並有所創造，其寓意深遠。歷史的發展是由一系列歷史事件構成的，而編年、紀傳二體，限於各自的弊病，並不能很好地展示歷史事件的發展過程、探求其變化與得失。故袁樞書出，立即受同代學者楊萬里、呂祖謙、朱熹等讚賞，以至於得到了宋孝宗的讚賞，“以賜東宮，及分賜江上諸帥，且令熟讀，曰：‘治道盡在是矣！’”^②可見，紀事本末體無疑更能彰顯歷史的發展，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至於朱子綱目之體，要求凸顯綱舉目張，目的是恢復孔子《春秋》之義，便於對歷史事件作評論，按主觀的政治需要汲取所謂的歷史經驗教訓。郭氏選取二體並使之結合，無疑能更好地表達他著《蜀鑑》的目的。既清楚地敘述了每次蜀地用兵的歷史過程，又詳細地考證了古今地理的變化，檢討了以往用兵的得失。

紀事本末長於敘事而短於說理，綱目卻長於條理評論而缺乏豐富敘事。紀事與綱目二體的巧妙結合，在歷史編纂學上是一次新的創舉，充分發揮了二體之長，又規避了二體之短。這樣，既能清楚地表述歷史事件的發展變化，又便於對其進行分析與評

① 見《四庫全書總目》卷四十九，《蜀鑑》，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438頁。下文四庫館臣所言均見此。

② 見《宋史》卷三八九，《袁樞傳》，第11934頁。

價，做到了敘述與議論相結合，為歷史的表述提供了一種新的方式。郭氏之舉，功莫大焉。

二、《蜀鑑》的內容與特點

《蜀鑑》所載內容，李文子在序中作了交代，其曰：“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邇雍而鄰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於篇。西南夷為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鑒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為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概見於此。”可見，《蜀鑑》主要記載的是宋以前四川及其周邊地區的歷史發展，包括今四川、重慶、貴州、雲南以及隴南、陝南和鄂西地區。時間從秦厲公二十六年（前451）秦城南鄭至宋乾德三年（965）王全斌滅後蜀，共1416年。因此，《蜀鑑》可以說是一部西南地區的通史著作。

在這一千四百多年的歷史中，郭氏按時間順序條縷分析，或因事命篇、或因類命篇地進行記載，共計51件大事，分成十卷。卷一：秦人取南鄭，秦人取蜀，秦人取漢中，秦人自蜀伐楚，漢高帝由蜀漢定三秦，公孫述盡有蜀地，光武得隴望蜀，岑彭、吳漢由江道取蜀；卷二：曹操平張魯取漢中，昭烈君臣由江道入蜀，吳蜀分荊州，昭烈取漢中，關羽失荊州，蜀失漢中三郡，昭烈攻荊州不利；卷三：漢諸葛忠武侯北伐，蜀漢蔣琬、費禕保蜀，姜維出師隴右，鄧艾、鍾會取蜀；卷四：晉王濬自蜀平吳，李特入蜀，羅尚討李特，李雄入成都，羅尚抗李雄，李雄偽定蜀地，蜀人杜弢等流徙荆湘，元溫討李勢，李壽縱獠於蜀；卷五：江左不用蜀，苻堅取蜀，晉復取蜀，劉裕討譙縱；卷六：氐羌楊氏據武都，蜀刺史始不專用武人，魏邢巒謀伐蜀，梁魏爭漢中，西魏尉遲迥取蜀；卷七：唐明皇幸蜀，高宗文討劉闢，唐僖宗幸蜀，王建據蜀，岐蜀交爭，高季昌攻蜀夔州，後唐取蜀；卷八：孟知祥、董璋連兵拒命，孟知祥圖蜀，孟知祥擊東川全有蜀地，孟昶得階成秦鳳四州，周世宗伐蜀取四州，本朝王全斌下蜀；卷

九：西南夷本末上；卷十：西南夷本末下。

從上述各卷的名稱來看，《蜀鑑》記載的內容主要圍繞歷代王朝在蜀地的經略而展開，所述的 51 件大事都是有關於軍事的攻略，特別是考察關隘邊戍在蜀地攻守中的戰略地位，總結歷代王朝治蜀的成敗得失與用兵的經驗教訓，為南宋後期加強防禦保有蜀地而提供借鑒。因此，《蜀鑑》一書，具有強烈的經世意識。如在“秦人取南鄭”章，郭氏就評論道：“常璩謂蜀以褒斜為前門。則南鄭者，蜀之扞蔽也。南鄭既入秦，七十二年而蜀遂亡，唇亡齒寒也久矣。後之經理蜀者可不鑒乎！”指出了南鄭對於蜀地的重要性，並誠告後之治蜀者要對此重視。在“氐羌楊氏據武都”章，郭氏分析了保有蜀地的屏障，認為“褒斜漢中，蜀之門戶也。武都，又漢中之藩籬也”，“無武都則無漢中，無漢中則無蜀”。同時，郭氏還對江左君臣治蜀的失敗進行了總結，認為“江左君臣視蜀如土梗弁髦然，自以為長江全勢無俟乎蜀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所以，在“晉王濬自蜀平吳”章，郭氏對南宋朝廷沒有充分的認識到蜀地在全局中的戰略地位而進行了批評，其曰：“蜀繫於上流之安危，亦大彰明較著矣。晉武之平吳，用蜀之力如此。而子孫之偏安于江東者，乃棄蜀弗顧，可勝責哉。”在“本朝王全斌下蜀”章，郭氏更加著重強調了蜀地的戰略地位和保蜀對於全局的重要性。其云“中興以來，虎臣宿將極力捍禦，如手足之衛頭目，民之戴宋有死無二，三百年猶一日也。夫以藝祖之宵旰以圖蜀，其艱且勤也如此。蜀在今日為上流之重也如此，保蜀如保元氣，猶懼不支，況輕視而淺謀乎！念祖宗有蜀之勤，而顧今日保蜀之不易，則昔人之得失為永鑒歟”。

山河破碎，家國蒙難，統觀郭氏論述，其眷眷憂國之情無不躍然於紙上。因此，可以說《蜀鑑》是經世致用之作。“今蜀事如許，此書之出，豈不足為經理恢拓者之助乎！”別之傑可謂深悉郭氏之心也。

除此之外，《蜀鑑》的另一特點是於地理考證頗為精詳。在

《蜀鑑》敘事中，郭氏於每次用兵要地、關隘險阻都徵引了大量的文獻資料進行考證，並注明今在何地。這樣，不僅指明了各軍事要地的地理位置，而且也指導着防禦佈局的戰略要點。因此，《蜀鑑》於軍事地理的價值甚高。

考察《蜀鑑》的地理學成就，何玉紅作過研究^①，主要有以下兩點：

一是直接注明古地名在南宋時的地理位置。如卷一“漢高帝由蜀漢定三秦”章記載，“故道，在今鳳州兩當縣。陳倉，在鳳翔府寶雞縣。好時，在鳳翔府天興縣”。卷一“公孫述盡有蜀地”章記載，“武都，今階州；天水，今秦州；河池，今鳳州；下辨，今成州；散關，今大散關；谷口，在今鳳翔府郿縣；武關，今商州；南陽，今鄧州”，“江州，縣名，今重慶府；閬中，今閬州”等。這在《蜀鑑》中比比皆是。除了純地理考證的學術價值而外，恐怕更多地還是軍事上的價值。

二是考鏡源流，辨正謬誤。郭氏對於戰略要地、關隘城戍曾多致意，徵引大量的文獻進行考辨，或明晰其沿革，或指明其謬誤，體現了其言而有徵的治學態度。如卷一“公孫述盡有蜀地”章對“扞關”的考辨，就辨明了“扞關”、“江關”之別。其云：“《史記》張儀說楚曰：‘秦西有巴蜀，大舡下水而浮，一日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拒扞關，扞關驚，則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矣。’《史記索隱》以為扞關即魚復江關，今瞿唐關。顏師古注、《輿地廣記》、《郡縣志》皆仍其說。惟《後漢史》注，扞關在今峽州巴山縣。樂史《寰宇記》峽州長楊縣有古扞關城，尚存，即巴山縣地。此為得之。扞關實楚地，《史記》稱楚肅王所築。今巫郡江關則乃屬巴地，故張儀云拒扞關，則黔中、巫郡非秦有，拒抵也。至若黔中、巫郡，皆在楚扞關之外也，蓋扞關乃楚之扞關，江關乃巴蜀之江關也。述據扞關，則荆門虎牙在扞關之

^① 何玉紅：《南宋郭允蹈〈蜀鑑〉述論》，《中國地方志》2007年第11期。本文此段於何文多有參考。

內，皆其設險之地，豈肯先自隘而但守魚復之江關哉？故辨之以正地理之闕。”再如卷二“昭烈取漢中”章中對《寰宇記》記載“馬鳴閣”的地理位置產生了懷疑，認為“馬鳴閣”非在昭化縣境^①。從《三國志·徐晃傳》的曹操的“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之語來看，馬鳴閣道是連接魏軍內外的重要通道，應在陽平關（指古陽平關）以西、西北或北面，是陽平通向武都或關中的咽喉要道。因此，郭氏所作應為確論。

《蜀鑑》取材廣泛，徵引了大量的文獻資料，李文子稱“稽之舊史，按之圖志”，其中一些文獻或文句在今天已經亡佚，可收輯佚之功。如卷一“岑彭、吳漢由江道取蜀”篇中引《太平寰宇記》“津鄉故城，在今江陵縣東，渚宮即其地”來考證“津鄉”所在。此句在今本《太平寰宇記》中已佚。又如卷九“西南夷上”篇中所引《華陽國志》“邛徠山，本名邛笮，故邛人、笮人界也。岩阻峻回，曲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句，在今本《華陽國志》中已佚。同時，還可據《蜀鑑》考察一些文獻的流傳情況。在卷五“劉裕討譙縱”篇中，引用了《水經注》“江水又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句，郭氏進行了考辨，認為“江水未嘗絕綿洛”。按：郭氏所辨甚是，考察《水經注》“江水”篇，本應是“湔水又東絕綿洛”。這說明宋時《水經注》已致誤。

除此之外，《蜀鑑》還引述了許多時賢的評論，如司馬光、范祖禹、胡寅、李燾、魏了翁等。這些評論多為他書所不載，全賴《蜀鑑》而得以保存，因而史料價值很高。如李燾對於南北朝時期蜀土凋零的評論，就為他書所不見。其云：“自晉永和而元溫始平李氏，訖梁承聖而蜀乃盡入於周，跨歷四代，咸撫而有。雖苻堅之侵陷，譙縱之盜竊，聲教暫阻而旋即討平。其職貢於江東者，年所居多，而蜀土未有光顯者，豈果無人？當兩漢之際，蜀人文章節義，足以冠冕海內，柱石帝京。夫豈足用於兩

^① 此四庫館臣已拈出之，但沒指明原由。

漢，而無用於晉宋齊梁者？失在於不能招徠之也。”^①

三、《蜀鑑》的刊佈與流傳

就現在所知，《蜀鑑》最早的刻本應為宋本。宋本於明代尚有傳。據明張佳胤序文可知，宋本原藏於李廷相家，後又歸晁璠所藏。^②查晁氏《寶文堂書目》，確載《蜀鑑》為宋版。惜其後失傳。根據李文子跋文與別之傑的跋文來推斷，可能宋本為李文子所刻於宋嘉熙年間。

有元一代，《蜀鑑》無刻本。雖惠棟《百歲堂藏書目》稱“《蜀鑑》十卷，李文子刻，元槧”。後是書歸黃丕烈所藏，經其考辨，認為是明初版。^③

明初版，為明洪武時蜀獻王朱椿主持所刻，又稱蜀藩本。時方孝孺為蜀王世子傅，奉旨撰有序言。據傅增湘稱，此刻半葉八行，行十六字，白口，雙欄^④。在明代藏書家的書目中，此刻多有記載。如鈕石溪《會稽鈕氏世學樓珍藏圖書目》載：“《蜀鑑》十卷，國初刊本。宋郭允蹈撰，有端平三年昭武李文子序，嘉熙丁酉重五文子跋，淳祐五年佚名氏跋。”^⑤同時，此刻也為皇家所藏。明正統六年（1441），內閣大學士楊士奇等清理南京北運之書而撰《文淵閣書目》，其稱“《蜀鑑》，一部四冊”^⑥。錢溥完成於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的《秘閣書目》也載“《蜀鑑》

① 見《蜀鑑》，巴蜀書社，1984年，第284—285頁。

② 張佳胤《蜀鑑序》，見郭允蹈《蜀鑑》，《叢書集成初編》本。

③ 見《蕘圃藏書題識》卷二，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第91頁。

④ 見《藏園群書題記》卷第三，《明初本蜀鑑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5頁。疑傅氏所見為嘉靖刻本。筆者考察了國圖所藏的嘉靖刻本、北大圖書館所藏的嘉靖刻本及巴蜀書社影印的嘉靖刻本後，發現序言、跋語與正文的版式不一，為半葉七行十三字，白口，花單魚尾，四周雙邊。因嘉靖刻本據宋版抄本而刻，故應缺別跋和方序，頗疑張肖甫將明初本的序跋移植於嘉靖刻本中。

⑤ 見《明代書目題跋叢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4年，第1561頁。

⑥ 見《明代書目題跋叢刊》第60頁。

四本”^①。可見，明初刻本分為四冊，可能卷一至卷三為一冊，卷四至卷六為一冊，卷七、卷八為一冊，卷九、卷十為一冊。至清代，此刻仍存。惠棟百歲堂所藏已非完璧，缺首二卷，黃丕烈從張白華家借得此刻完本，影抄補足之。後黃氏所補本歸陸心源皕宋樓。陸氏在《皕宋樓藏書志》中錄有復翁跋識以明之。^②此外，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也載有此刻本^③，並錄端平三年李文子序、嘉熙丁酉重五文子跋和淳祐五年別跋以存之。莫友芝也曾經眼^④。遺憾的是，此刻本傳人民國時期是更加殘缺。據張元濟先生所見，卷四至卷八皆缺^⑤。李盛鐸先生藏有一殘刻本。其在《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中記載道：“《蜀鑑》十卷（存卷一至三、卷九至十），宋郭允蹈撰，明初刻本。半葉八行，行十六字。前有端平三年李文子序，嘉熙丁酉文子跋。缺四、五、六、七、八五卷。”^⑥現此刻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然《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卻認為此殘本為明嘉靖三十四年刻本^⑦，可謂是慧眼獨識。筆者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查證此刻，發現雖缺方孝孺序，然嘉靖刻本誤者而此本也誤，其卷九、卷十也是各為一冊。因此，明初蜀藩本至今竟不存。

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刻本，為張佳胤所刻。因嘉靖三十四年為乙卯年，故又稱為嘉靖乙卯本。張佳胤（1526—1588）字肖甫，明重慶府銅梁縣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1550）進

① 見《明代書目題跋叢刊》第653頁。

② 見《皕宋樓藏書志》卷二十二，第16—17頁，光緒八年十萬卷樓刊本。

③ 見《愛日精廬藏書志》卷十，第5頁，道光元年愛日精廬刊本。

④ 見《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第四“紀事”，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88頁。

⑤ 見張人鳳編：《張元濟古籍書目序跋彙編》（上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批注”，第4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

⑥ 見李盛鐸撰，張玉範整理：《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第102頁。

⑦ 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191頁。

士，授滑縣令。《明史》有傳。由其序文可知，佳胤在滑縣任內，曾借晁瑬《蜀鑑》宋版而抄錄之，在嘉靖乙卯年據所抄宋版而刻之。據傅增湘交代，“明嘉靖本，八行十六字，白口，單欄。前有方孝孺序，次嘉靖乙卯張佳胤題，後有嘉熙丁酉文子跋、淳祐五年別口跋。”同時，傅氏還認為“此本字大如錢，板刻極古，殊不類嘉靖通行本風氣”^①，以表示對嘉靖刻本的懷疑。在《藏園群書題記》中，傅氏進一步認為嘉靖刻本即是明初蜀藩本。其云：“其版（蜀藩本刻板）傳至嘉靖，張肖甫得之，補訂而附跋於後，然則所謂元刻、嘉靖刻，皆此蜀藩本也。緣其字畫古茂，或者疑為元刻；又見其補版附有張氏跋，遂認為嘉靖刻耳。”^② 1984年，巴蜀書社影印了嘉靖刻本，正文為半葉八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單邊。據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記載，其曾用影宋寫本校蜀藩本，指出了蜀藩本的一些錯誤。如其稱“光武建武元年，延岑屯杜陵，與赤眉逢安戰，大破之，蜀本‘與’誤‘興’。漢中王嘉亦與赤眉將廖湛戰於谷口，大破之，蜀本脫‘口’字”等等^③，皆與巴蜀書社影印的嘉靖刻本符合。可見，嘉靖刻本與蜀藩本版式差別不大，以至於誤了傅氏、瞿氏法眼，誤把嘉靖刻本當做蜀藩本。其實，在清代後期，蜀藩本已不多見，書估往往利用嘉靖刻本來作假。他們或割去方序，冒充宋刻；或割去張佳胤題，冒充蜀本。蜀藩本為四冊，而嘉靖刻本卻為八冊。其卷一至卷三為一冊，卷四為一冊，卷五為一冊，卷六為一冊，卷七為一冊，卷八為一冊，卷九為一冊，卷十為一冊。傳至清代，此刻本已不多見。《鄭堂讀書記》載其序跋為前有端平丙申公瑾序及方孝孺序、張佳胤題，後有嘉熙丁酉文子跋及淳祐丁未公瑾門人跋。現國家圖書館所藏嘉靖刻本乃明汲古閣

① 見《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69頁。

② 見《藏園群書題記》卷第三，《明初本蜀鑑跋》。

③ 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九，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第144頁。

藏本，翁同書於道光二十四年購于京師書肆，並作有跋語^①。此外，上海圖書館、浙江圖書館、吉林圖書館、四川圖書館均有收藏。

清代乾隆時期編修《四庫全書》，《蜀鑑》赫然在列，為兩淮鹽政李質穎在浙江所采進。查《浙江采進遺書總錄》，注明《蜀鑑》為刊本；又查《各省進呈書目》，注明《蜀鑑》為四本。可見，采進本當為蜀藩本，非嘉靖刻本。據《蜀鑑》四庫本來考察，采進時已非完璧並有所改動。如卷八末郭氏所論，自“淪肌浹髓”以下已經殘缺（注明下闕）；卷二中的標題“關羽失荊州”也改為“孫權襲荊州”；在卷七的“高季昌攻蜀夔州”缺少了“夔州”二字。

清道光、咸豐年間，金山錢氏編輯“《守山閣叢書》”，《蜀鑑》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從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中輯出刊刻，二十四年（1844）又重刊。共兩冊，卷一至卷六為一冊，卷七至卷十為一冊。半葉十一行二十三字，黑口，左右雙邊，並在每卷篇目下注有“四庫全書原本”字樣。其實，與四庫本相比較，《守山閣叢書》本還是有變化的。如在卷八末郭氏所論的殘缺部分，臆補上了“億萬年安枕矣”六字^②，使得意思完整。同時，錢氏還針對《蜀鑑》中年代紀事的錯誤，依據其他文獻進行了辨證，用小字雙行注於其下。傅增湘曾用影宋寫本校過此本。傅校本現藏國家圖書館。

《守山閣叢書》本在《蜀鑑》版本傳承中地位十分重要。自此之後，《蜀鑑》刻本、印本多祖從此本。如光緒五年（1879）重刊于成都的吳興吳氏貽穀堂本，半葉十三行二十二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左右雙邊，雙魚尾，象鼻下有“貽谷堂吳氏刊”字樣；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鴻文書局的石印本；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齋的影印本；民國二十五年（1936）據貽

① 見《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史部上），第191頁。

② 此傅增湘已拈出，見《藏園群書題記》卷第三，《校蜀鑑跋》。

谷堂本重校刊的成都志古堂本，半葉十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黑口，左右雙邊，對花魚尾；民國二十六年（1937）長沙商務印書館排印的《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的萬有文庫本等，都屬於《守山閣叢書》本系統。

除刻本而外，《蜀鑑》尚有抄本傳世。從前述可知，張佳胤曾從晁瑬處得宋刻而抄，並據之而刻嘉靖本。然張抄本卻沒傳世，明清諸家均無記載。據黃丕烈《菴園藏書題識》記載，其家藏有明抄本，為張充之所抄^①。張充之，長洲（今江蘇蘇州）人，名德榮，《書林清話》也載其抄有《蜀鑑》十卷。惜黃氏之後，其書不傳。又瞿氏《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記載，其家有《蜀鑑》舊抄本，在卷六後有題識云：“隆慶元年，歲在丁卯，仲春二月上旬，在於翠筠軒下錄之。”卷十後有題識云：“鋪序整飭，記載詳到，雖其文句不能如《華陽國志》之秀拔瞻美，而每值郡邑土地，每為標注，使考蜀事者不至混漫，此則有特長焉。嗚呼，恭擬于《華陽志》，可為合之則聯璧矣！其又歷唐抵宋元千三百載上下之事蹟為蜀全書，美矣夫。明嘉靖間姑蘇吳岫識。”^②吳岫，字方山，號濠南居士，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明嘉靖時藏書家，前後收書逾萬卷，有藏書樓為“塵外軒”。此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兩冊，十行十六字，無格，缺方孝孺序和別之傑跋。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卻注之為明隆慶元年翠筠軒抄本，當誤。隆慶在嘉靖之後，此本在嘉靖間已為吳岫所藏，當是嘉靖時成書矣。方山之後，此本在隆慶元年（1567）落入翠筠軒主人之手，故錄而志之。瞿氏、傅氏均稱此本為影宋寫本，並用之校過刻本。用此本與嘉靖刻本比較，我們發現此本致誤處而嘉靖刻本皆誤，抑或是張佳胤抄本乎？瞿氏據此本進行了影抄，共六冊，卷一至卷三為一冊，卷四、五為一冊，卷六為

① 按：查《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張充之乃清人。疑菴園所記有誤。

② 見瞿良士輯：《鐵琴銅劍樓藏書題跋集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0—61頁。

一冊，卷七為一冊，卷八、九為一冊，卷十為一冊。半葉十行十六字，花魚尾，左右雙邊，版心有“海虞瞿氏鐵琴銅劍樓影鈔本”字樣。又有摹本流至北平館中，為傅增湘用以校勘《守山閣叢書》本^①。

此外，據《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記載，尚有清初抄本，彭元瑞作有跋文。彭元瑞字掌仍，一字輯五，號芸楣。博學強記，時有令譽，為《四庫全書》十個副總裁之一。其跋文云：“《蜀鑑》為宋南渡後之蜀言之也。觀其敘述往事，於所以保蜀與所以失蜀者，三致意焉。序中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似乎豫知有吳曦之禍。而元之亡宋，必先取蜀。固非如《華陽國志》、《錦裏耆舊傳》徒資地理掌故也。方正學重刻序，則為蜀王言之易曰，辭也者，各指其所之。於此可以悟立言之法，其後輔建文，致靖難之變，蓋其防制宗藩之意胚胎已蚤矣。”^②此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兩冊，十行二十字，黑格，白口，左右雙邊。從內容考查得知，此本當抄自嘉靖刻本。

對於《蜀鑑》一書，前人向無注釋。唯光緒七年九月歸安吳文升撰有《蜀鑑札記》一卷，他運用《蜀鑑》所徵引的文獻對《蜀鑑》篇中的字句進行了勘誤或補充。又傅增湘出於對鄉邦文獻的熱愛，對《蜀鑑》作過校勘，惜未刊印。二者皆有發凡之功。至於對《蜀鑑》作研究，除何玉紅《南宋郭允蹈〈蜀鑑〉述論》一文外，尚無其他。

四、《蜀鑑》的整理

正是看到《蜀鑑》這部古籍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有進一步進行系統整理的需要，因此，校注者不揣淺陋，進行了這本《蜀鑑校注》的撰寫工作。

① 見《藏園群書題記》卷第三，《校蜀鑒跋》。

② 見彭元瑞：《知聖道齋讀書跋》卷一，《蜀鑑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